

熊云滨与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

方彦寿

熊云滨，名体忠，字尔报，云滨乃其号。明末清初福建建阳县崇化里书林（今书坊乡）人。其祖辈有熊宗立、熊大木等刻书名家。熊云滨承其祖业，也刊刻了不少书籍^①，翻刻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便是其中之一。

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通常认为即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，明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刻本，北京图书馆存有此书胶卷。实际上，此本应为明万历间建阳书林熊云滨重刻世德堂本。对此，各家书目均有所忽略，如孙楷第先生在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著录此本时即忽略了何以在唐氏世德堂的刻本中会出现“书林熊云滨重镌”的刊记。王重民先生在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中则认为，此本也许是金陵熊氏荣寿堂据世德堂原版重印者，虽较孙楷第先生的说法进了一步，遗憾的是将建阳书林的熊云滨误认为是金陵荣寿堂的老板了。

窃以为，现存被称为“世德堂本”的《西游记》，实际上应为明万历间建阳书林熊云滨重刻世德堂本。首先，孙楷第先生传录此本所据底本是日本藏本，王重民先生传录本是原北平图书馆藏本，二者均称此本卷中有“书林熊云滨重镌”刊记，这就排除了是两种刻本偶然搭配而成的可能性，说明熊氏与世德堂唐氏之间存在着某种翻刻与被翻刻的关系。其次，从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此书名看，即非世德堂原名，而是熊云滨翻刻后改动新加的。一是“新刻”，指的就是“重镌”，可与书内“书林熊云滨重镌”刊记对照起来看。也正因是“新刻”，表明此之前尚有“旧刻”。这个“旧刻”，应即世德堂原本。二是“官板”，

这是建阳书坊刻本的“土特产”。这里刻书，“凡翻南京、北京书，皆冠以京本二字，以示来源，有别杜撰”^②。“官板”与“京本”虽含义有别，但目的相同，既可以用来号召读者，还可以应付官方的审查^③。三是“大字”。此本行款为半页十二行，行二十四字。查唐氏世德堂刻本，如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》、《南北两宋志传》等均为此行款，却没有象此本那样冠以“大字”标榜。杜信孚《明代版刻综录》著录了唐氏世德堂刻小说、戏曲凡十六种，仅此《西游记》一种有署所谓“官板大字”。可见，这种行款在唐氏来说是常用的，无需在书名上醒目地告诉读者。而在熊云滨则不然，在熊翻本问世前，建阳书坊至少已有杨闽斋的《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》，有刘莲台的《鼎镌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》在市面流传。杨本半页十五行，行二十七字，“字”虽不如熊本的“大”，刻工亦不甚精，但因较熊刻本在前而占了一定优势。刘本则以节本形式出现，因价格便宜吸引了读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熊云滨要招揽读者，也为了与杨、刘二本有所区别，就在题目上动了一番脑筋，这才有了所谓“大字官板”《西游记》的问世。本来，熊刻本是照式翻刻金陵刻本，可以名符其实地称为“京本”，但因有杨闽斋的“鼎镌京本”在前，故舍“京本”而诡称“官板”。

既然我们认为此本系熊氏翻刻本，这就需搞清熊刻本对世德堂原刻本在内容上是否有所窜改？回答是否定的。首先熊本在行款格式上一如世本，已如前所述。其次，熊本将世本的原牌记均依样画葫芦地照抄照刻下来，虽是为了增强他所称的“官板”的“可靠性”，但仅从这点已约略可知，他在内容上也是照式翻刻。这种照式翻刻的现象在嘉靖以后的书坊是很普遍的。其产生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嘉靖年间。嘉靖十一年福建按察司就建阳书坊翻刻四书五经，每妄加窜改之事，曾下牒文至建宁府，“转发建阳县，拘各刻书匠到官，每给一部（样书），严督务要照式翻刊。”“再

不许故违官式，另自改刊。如有违谬，拿问重罪，追版划毁，决不轻贷”^④。牒文指的虽是四书五经一类典籍要照式翻刻，但矫枉过正，形成翻刻其它古籍也每每照式而为的风气，甚至连原书牌记、板心的刻工姓名等也统统摹刻下来。熊本照式翻刻世本，只不过是这种现象的流风余韵罢了，亦不值得奇怪。

何以断定熊云滨是建阳而非金陵人？除了熊氏刻本刊记中有时自称“建阳后学云滨熊体忠”外，我在《潭阳熊氏宗谱》^⑤中查到了熊氏的生平记载：

（廿六世）奏郎，辅公长子，行康三，字文溪。……生子三：体忠、体信、体道。

（廿七世）体忠，奏郎公长子，行宁三，字尔报。邑庠生，歿失考……

——以上录自恭房伯杞公派辅公世系

大清发科儒林籍：

体忠字尔报，号云滨。清初年间，书林未习儒业，兄弟笃志嗜学，庠序冠首，载《同文志书》。曰从同游者，一时名宦若明经则有郑以初、熊志学，两榜刘孔敬，庠生余用晦、杨鞭坂，监生余应虬等。或德行，或著述，或职司藩臬，或掌训导教谕，莫不济济著美也。辑有《四书大传》、《书经久传》、《书经鲸音》、《玉堂纲鉴》、《二经精解》、《南华副墨》、《遵生八笈》等集。兵部侍郎陈省号幼溪者来游武夷，踵第相谒，促膝旦夕，重创同文书院，经营缔造，立石存焉。

四部尚书宗（亲）明遇^⑥赞曰：

艺林师表，德性汪洋。才优望重，山斗文章。心传道脉，桃李芬芳。宜乎振振，奕世腾骧。

——以上录自卷首《熊氏西族贤宦籍》

宗谱对熊云滨的生平记载并不十分全面。一是因生卒年失考，只

知清初的熊云滨而不知他实为明末清初人；二是遗漏了他曾从事刻书业；三是误把熊云滨所刻《玉堂鉴纲》、《二经精解》等书称为“辑”^⑦，尽管这样，宗谱所录已足以证明熊云滨系明末建阳书林刻书家。

熊氏刻本的意义在于完整地保存了世德堂本，即现存最早也最接近吴承恩原作的刻本的本来面貌，为研究《西游记》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版本资料。在各家书目均有所忽略的情况下，特为指出，以就教于专家。

注：

①熊云滨所刻书今可考者有刻于万历二十二年的《玉堂校传如岗陈先生二经精解全编》九卷，《庄子南华经精解》九卷、《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》十三卷；刻于万历二十五年的《鼎锲李先生易经考传新讲》七卷；刻于万历二十七年的《精刻初集阳宅真传秘诀》六卷等近十种。

②郑振铎《西游记的演化》，《西谛书话》上册页59—60。

③建本书题中冠以“官板”者，以明万历间最多，如万历三十年余良进怡庆堂《新刊官板本草真诠》、万历四十三年余继泉刻《新刻官板地理造福玄机体用全书》、明万历书林余氏刻《申学士校正古官版书经大全》等。

④缪荃孙《艺风藏书续记》卷一，又见《福建通志·版本志》经部卷三。

⑤详见拙文《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考》中的介绍，载《文献》1987年第1期。

⑥建阳熊氏的祖籍江西南昌，与熊明遇本为同宗。唐末始祖熊秘入闽，定居建阳崇泰里熊屯。熊明遇，字坛石，万历进士，历官吏、户、礼、兵部尚书，明末避地入闽，寓建阳崇泰里熊屯，五载回籍，尽节死。

⑦《玉堂鉴纲》七十二卷，明叶向高汇编，明建阳书林熊体忠刻，现存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。《二经精解》九卷，明陈懿典撰，明万历二十二年熊云滨刻，现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福建省建阳县物资局